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

第三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第一节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坚持斗争

大革命受挫，暂时转入低潮的岁月，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白色恐怖笼罩着合浦。

1927年9月，中共东兴支部书记钟竹筠在东兴被捕，连夜押至北海。1928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派李复到北海，后因经费欠缺和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严密未能成行。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年底，南路特委遭到破坏，成员多被捕或牺牲，中共广东省委任幸存下来的委员易一德为中共南路巡视员并派其到北海恢复党组织。易一德到北海后，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坚持在北海活动。1929年5月，易一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牺牲，党组织又一次中断。但从外地撤退来掩蔽、从事潜伏活动的党员仍然艰难地独立工作。在这白色恐怖的岁月里，艰难地恢复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与上级联系几度中断，党的优秀儿女一批批被捕牺牲，受到残酷的镇压。5月31日晚，钟竹筠在北海西炮台被杀害。

1927年夏秋之间，遂溪、海康、廉江、吴川等县的工农革命武装，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and 高压统治，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各地的武装起义与强敌作正面交锋，遭到较大的损失，高雷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已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

自从7月1日遂溪县工农武装在乐民城撤出后，反动武装旋即进入乐民城疯狂洗劫。为了利于保存革命力量和坚持长期斗争，黄广渊、陈光礼等领导人决定将武装起义大队分为两路继续坚持斗争：一路由黄广渊带领留在遂溪第六、第七区一带，以武装小队的形式分散活动于乐民、河头、江洪、纪家等地的农村，秘密建立交通情报站点，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并伺机打击地方反动分子；另一路由陈光礼、刘坚带领转移到徐闻山，设法教育、争取以陈中华为首的“绿林”武装，从而扩大农军队伍。

9月，黄广渊牺牲，陈光礼接任雷州县委书记，遂溪的形势更加严峻。10月间，陈光礼为了利于领导遂溪、海康两县党组织开展斗争，决定带领小股农军由徐闻山重返遂溪第六区，同时布置薛经辉、刘坚率领其余农军及改编后的陈中华部，转移到北部湾上的斜阳岛开辟根据地。

第二节 斜阳岛农军的悲壮战斗

斜阳岛是合浦县境内的一个火山口小岛，东距遂溪江洪30海里，北距北海45海里，西距涠洲岛9海里，面积1.89平方公里，四周高，中间低，最高的羊咩岭海拔140余米，

位于西南面。岛的四面都是悬崖峭壁，长满仙人掌及茅草，只有两条狭窄陡峭的小路可攀登而上，地势险要。岛上有20多户农民，有数十亩地可种玉米、红薯等作物，收成低而不稳，不能自给；饮水困难，靠濠洲岛等地供应。

斜阳岛此时被海康县（今雷州市）过来的海匪符振岳所盘踞，他是因父母遭地主杀害后，为报父母之仇，杀了地主并聚集10多人逃到徐闻山，1926年率部逃到斜阳岛，此后投奔他的人很多，形成一股拥有100多人的强悍武装。符振岳沦为海匪，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本人经历所造成的，他对农军有着某种共识，在遂溪，国民党围攻乐民农军时，他主动率部参战，帮助农军攻打国民党军。在农军放弃乐民时，他又回到斜阳岛，既不居功，也无怨言。

农军上岛后，积极垦地，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禽家畜，出海捕鱼到濠洲岛等地出卖，换回粮食及用品，生活十分困难。农军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开展政治教育，加强军事训练，领导干部和战士共甘苦，使队伍稳定下来，坚定革命信心，加强战斗意志，在艰苦环境中坚持下去。

农军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待人和气，保护群众利益，对比之下，符振岳所属部下却像一群乌合之众。符振岳及其部属耳闻目睹，内心萌发出一种脱离海匪，加入农军的强烈愿望。在陈光礼等的帮助教育下，符振岳懂得了“打倒列强，清除军阀”的道理，明白了只有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农军联合，才能壮大革命势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贫苦人民才得到解放。于是他率部接受农军的收编，参加农军队伍。收编符振岳部是农军上岛前南路特委对农军的指示和期待，现在符振岳接受改编，农军力量更强大。

1928年5月，农军改编成立大会在濠洲岛南湾街举行。会上宣布符振岳、陈中华部正式加入农军队伍，农军总指挥为陈光礼，副总指挥为薛经光，农军编为两个营，第一营长符振岳、副营长陈中华，第二营长薛经辉、副营长余道生。

农军在斜阳岛上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为尽快将革命势力扩展到雷州半岛，同时也为了摆脱长期据守孤岛，供应困难，发展余地窄小的困境，1928年春，农军回师内陆，与黄凌氏带领的农军会合后，在中共雷州县委的领导下举行年关暴动，先后两次袭击了驻遂溪第六区海山、乐民、余村、桂坡等地的反动武装，毙伤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物资。1928年8月，农军又潜回大陆，在桂坡伏击反动军队，歼灭部分敌人。9月8日，袭击遂溪，占领县城，俘虏未及时逃跑的敌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开仓济贫，开牢释囚，处决反动分子，后撤回安铺，在石坡击退追敌。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力量追击，农军无法和海南岛革命队伍联系，再次退回斜阳岛。

农军攻陷遂溪县城的胜利，震撼了广东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司令兼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命令南路绥靖委员陈章甫加紧“清剿”，扩大反动武装，加强防御戒备，加派汽艇封锁海面，大量屠杀支持和跟农军有联系的人，农军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处境十

分困难。

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1930年6月15日，余道生率农军潜回大陆，攻占乐民乡公所，毙敌8人，俘16人，破仓分粮，群众聚集慰问庆祝，随后农军主动撤回斜阳岛。

1930年8月24日，陈章甫等纠集反动武装围攻斜阳岛。农军和当地群众严守阵地，英勇抗击，历时一个多月，陈章甫反动武装无法上岸。从此，反动武装经常侵扰，农军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困难，形势日趋恶化，生活极其艰苦。

11月，农军领导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决定由陈光礼到海南岛寻找党组织，农军由薛经辉领导。27日，陈光礼秘密离开斜阳岛，经乐民前往海南，1931年春在海口被国民党逮捕，壮烈牺牲。

1931年9月12日，陈章甫等又纠集反动武装，乘几艘机帆船再犯斜阳岛。岛上军民严阵抗击，战斗20多天，陈章甫反动武装又以失败告终。

进攻斜阳岛屡次失败，陈济棠大为震怒，限令陈章甫务必在短时间内攻下斜阳岛。1932年5月，陈章甫率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团一个营担任主攻，另以廉阳水师的6艘军舰助战，合浦廉州大地主王广轩派出两艘汽艇和强夺的80艘渔船参战，决定采取铁壁合围、天天攻打（晚上回濶洲岛）、长期围困，使农军弹尽粮绝，然后实行大举强攻的战术，于1932年9月12日开始大规模的围攻。农军隐藏在岛上的岩洞里，待反动武装靠近才用火力和岩石加以致命的打击，反动武装受到严重的损失仍未得手。陈济棠看到进攻无效，又增派“安化”“广金”“海虎”三艘军舰和两架飞机来增强进攻，陈章甫派出他的代参谋长兼作战处长林廷华亲临前线督战。每天飞机飞到斜阳岛上空扫射、轰炸，军舰、汽艇逼近海岸炮轰和开机枪扫射，掩护反动武装登陆。猛攻一个月，反动武装付出多人死伤的代价，王广轩的孙子和“海虎”舰的电台负责人先后被打死，仍无法上岸，反动分子施展的欺骗诱降手段也告失败。

在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薛经辉等农军领导人加强对战士和群众的教育，动员他们坚持长期艰苦战斗。岛上军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不怕牺牲，顽强地抗击反动武装。但是，在反动武装长期封锁和不断战斗的情况下，伤员不断增加，子弹越来越少，粮食也吃光了，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农军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转移到海康、徐闻坚持斗争，派一只小船乘黑夜出海探路，因海上被层层封锁，而且风浪太大，折了回来，没有达到目的。不久，符振岳在防守东埠的战斗中牺牲，形势更加恶化。薛经辉决定撤离方案。11月21日，派两只小船，由岛上几个渔民载着十几个农军，利用黑夜离岛，往江洪港找船，意欲回岛接全部农军撤离斜阳岛。

反动武装长时间攻不下斜阳岛，决定用大洋收买100多人作敢死队，11月2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海风将敢死队的船吹到东埠港口，夹在礁石中退不出，敢死队冒险登

陆，农军因指挥员符振岳已牺牲，又缺子弹，石头也掷光了，东埠港被反动武装占据，随后，北埠、三条石、灶门等阵地相继失守。薛经辉指挥战士坚决抵抗，子弹打光了，用石头、枪把跟敢死队拼。黄安扬打光子弹后，毁了枪跳海自尽。余道生将还剩两颗子弹的手枪交身边的妻子赖英，叫她坚持斗争下去，将另一支长枪和文件毁掉，纵身跳下大海。符振岳的妻子梁四把结婚时的金戒指交给薛经辉后，亦投身海中。薛经辉指挥剩下的农军和群众退到羊咩岭临海悬崖半腰的羊咩洞中。羊咩洞洞口朝海，有小树挡着，洞深10多丈，可容200多人，农军和群众用麻绳吊下去，岛上看不见，炮火亦打不到，但无水无粮，难以长时间坚持。

薛经辉布置去江洪港的人找到4艘帆船，返回斜阳岛，黑夜里发现岛上火光冲天，知道斜阳岛已被攻占。反动武装已封锁岛的周边海域，看见帆船上的灯光，即开机枪扫射。返岛农军的船在附近海面转了很久，无法靠岸，只得忍痛折回江洪，这批战士和群众，后来大部分被捕牺牲。

反动武装上岛后，残杀未及躲起来的群众，逮捕10多个不足10岁的小孩，把房屋烧光，财物抢光。

薛经辉率剩下的农军和群众退入羊咩洞后，因为无水无粮，只能在晚上爬出去挖点小红薯、摘些野果，或偷反动武装的东西吃，但是难以果腹，人们饥渴得难以忍受。一些小孩忍不住，哭喊起来，母亲怕引来反动武装的炮轰和投弹，用破布把孩子的口塞住，不料竟把一个孩子捂死了。反动武装发现农军和群众躲进洞里，天天向洞口打枪，扔手榴弹，用炮轰，投棉花煤油火球，并向洞里喊话，要他们投降，但没有人出去。坚持到第七天，大家都软弱无力，眼看活不下去了，薛经辉召集军民研究，大家都表示宁愿饿死在洞里也不出去。最后领导考虑，不能让无辜群众也死在洞中，群众如能活，农军有个人可以混在其中出去向党汇报有关情况。第八天，当反动武装喊话时，薛经辉提出以不得伤害群众为条件，带领全部人员出洞。

薛经辉等人出洞后，反动武装叫群众和农军分别站队，群众将一些农军的青年和妇女（包括薛经辉的儿子和余道生的妻子赖英）认作自己的亲人，救出了少数人。薛经辉和农军战士40多人被全身捆绑，押到濠洲岛严刑摧残，薛经辉被香火把烙烂了全身，随后把他们押到北海，关禁在审判厅监狱，再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是，没有一个人变节。1932年11月中旬，反动派把他们全部杀害。临刑时，他们虽然衣服破烂，蓬头垢面，脚戴镣铐，但都昂首挺胸，精神焕发，一路高唱革命歌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慷慨就义，在南路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最悲壮的一页，以头颅和鲜血激励着人们继续革命。

在国民党的大屠杀下，遂溪党组织发动农民起义，组织农民武装，实行武装斗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转移到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薄弱的地方坚持武装斗争是对的。其失败的

原因，在于选择作为根据地的斜阳岛过于孤立狭小，没有跳跃和回旋的余地，在国民党反动武装长期围攻时，被动地守岛自卫，不灵活及早转移。

斜阳岛农军武装斗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南路地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农军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得不到及时救援，致使斜阳岛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在斜阳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符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为后来南路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对南路地区革命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斜阳岛农军失败后，中共在合浦直接领导的活动就暂时完全中断了。

第四章 左翼文化的兴起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合浦的传播

第一节 左翼文化的兴起和“绿波”书社的开设

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了殊死斗争。为了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高压统治，一批党的和受党所影响的革命文化人士聚集到上海，他们以笔杆为武器，在革命思想文化的阵地上，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0年在上海先后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不畏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政治高压和各种迫害，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一场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随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兴起和不断高涨，随着形势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统治的文化“围剿”，迅猛向全国各地扩展，并有力地激荡着合浦以及整个钦廉四属地区。

在合浦，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廉州中学等学校，有一批青年学生在共产主义思想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和学习新文化，寻找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一个以学习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他们秘密组织书社、读书会、出版墙报并组织学生进行罢课，反对学校无理开除学生。

1929年上半年，在合浦一中读书的进步青年赵世尧、黄铸夫（黄裕兴）、苏翰彦（苏觉民）、冯德（冯廉先）、傅劲才等组织读书小组，学习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书刊，出版《我们旬刊》杂志，发表文章批判反动保守的国民党反动右派，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9年秋，合浦一中从广州请来杜君恕、杜君慧（两姐妹）、冯道先、彭秩芬等一批进步教师到校任教。他们都是党教育和培养的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其中，杜君慧是留日学生，到合浦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冯道先是合浦县闸利乡山子背村人（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执行委员）。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推荐进步书籍，开展进步思想教育。冯道先亲历目睹社会的动荡和变革，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能明确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方向。他到北海后，率先办起专营进步书籍的书店，取名“绿波书社”，向北海的青年推介进步书刊，介绍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

“绿波书社”经营由上海和广州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各类革命书籍，像《新青年》《唯物辩证法》《大众哲学》以及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的小说和其他作品。合浦一中的学生是“绿波书社”的主要读者，那时比较进步和激进的赵世尧、冯德、苏翰彦、黄铸夫等经常到书店阅读书报，吸取新思想、新观念。杜君慧、杜君恕两姐妹也常常到书社阅读书报杂志，她们还经常带领学生到“绿波书社”参观，给学生们介绍鲁迅、郭

沫若、巴金等进步作家及其著作。由于“绿波书社”人来人往，摆在书架上的都是些进步书籍，常到书社的都是进步青年和学生，社会上也传言说“绿波书社”是共产党开办的书社，卖的都是共产党的书，因此慕名而来的读者络绎不绝。

1931年至1932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合浦的抗日文化也逐渐兴起。“绿波书社”本着招纳进步青年学习进步书籍、传播进步思想的理念，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激发学生爱国、救国的热情。“绿波书社”的举动和意图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北海当局指使警察局进行镇压和迫害，多次派人到书社抽查，企图查封书社和逮捕阅读进步书刊的人员。由于冯道先早有思想准备和机警，警察局没有搜出证据，奈何不得，只好悻悻而去。1932年，冯道先去广州求学，“绿波书社”停办。“绿波书社”开办两三年来，对合浦人民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影响深远，冯道先对合浦青少年早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合浦许多进步青年后来之所以办读书会，走上革命道路，“绿波书社”的进步书籍给他们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未名社”读书会的成立

1932年春，合浦一中学生赵世尧去广州求学不如意，秋天带着一批在广州购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包括《通俗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概论》等）以及《读书杂志》中有关社会性质和革命问题的论战材料等回到北海，进一中高中部读书，与同学冯德、陈锡贞、傅劲才、李俊生等商量，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吸收校外的黄铸夫、王文邕、周志刚（周小庭）、庞国泰、符荣业、朱光昭等人参加，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道理，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抗日。读书会取名为“未明社”，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需要战斗到明天”之意，表明了青年学生们追求真理、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息的决心。因“未明社”含义明显，恐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未明社”对外称“未名社”。他们把各班喜欢读书的进步同学尽可能地吸收进来，使更多的同学都来读进步书籍，争取思想进步，形成一股进步的力量。参加“未名社”的青年学生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谈论时局形势，参加由上海左翼人士发起的“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问题”的大辩论，从而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涌入革命洪流中。

赵世尧和黄铸夫研究，由黄铸夫回西场找一些进步分子成立同样的读书会，作为“未名社”的分支，参加的人开始有罗刚（罗秉乾）、朱明（罗秉森）、裴凤芝、林国奋、石起、吴华英、包恭（包卓福）、黄模、黄人善、黄裕起、王克（王鉴远）等。学习讨论内容及进度大致与北海相同，但因成员刚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多采用通俗启蒙的方法。1933年进一步扩大到社会青年、农民、私塾教师和学生、海员、店员，开展海员、店员及农民工作。1934年各重要小学的校董在竞选中获胜，由新董事会派人去当校长、教员，控制一批小学作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未名社”专门设立一个“合浦一中书报代售处”，以此名义与上海各进步书店联系。在上海的党中央出版局发行科专门与全国各地进步书店联系，发行进步书刊报纸，宣传党的理论，团结全国进步群众，发展党的力量。“未名社”与党中央出版局发行科的赵文卿（王均予）取得联系，王均予用各种假名从不同地址给“合浦一中书报代售处”寄来党的秘密出版物，如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从二月到十月》（文集）、《革命烈士传》、《红旗》、《斗争》、《中华苏维埃成立宣言》、《我们的经济政策》、《土地法》、《八一宣言》、《红军捷报》、《中国论坛》等刊物和小册子，为“未名社”提供充足的书刊，给读书会的青年和学生作为思想教育的学习资料。此后，赵世尧、黄铸夫等就经常利用通信和书报发行的形式，与上海党组织的有关人员建立起秘密的、经常的联系，接受他们的指导，直到1935年，他们把收到的党的主张和捷报，在北海秘密散发和张贴，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震惊。

为准备在社会上开展革命斗争，“未名社”派黄铸夫和李俊山到十万山和龙门港作实地调查，在北海附近进行渔民、农民调查，在市内作学校调查，办失学青年学校和夜校，招收失学青年学习，还举办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学习班。

1933春，合浦一中学生会改组，在进步学生的积极活动和秘密互动下，全校班代表会推选出赵世尧、苏翰彦、罗绍周为学生会理事，主持全校学生会工作，使学生掌握在“未名社”读书成员和进步学生手中。学生会也通过在合浦一中办的书报代售处，发动学生订阅和购买《生活周刊》《生活知识》《中国论坛》等书刊以及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各种进步书籍杂志。

为了扩大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阵地，使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1933年秋季开学后，“未名社”在合浦一中成立“新哲学研究会”，发动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压制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和阻碍学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各种反动措施。合浦一中“未名社”读书会的骨干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重建中共北海党组织的精英。

在“未名社”的影响下，1934年下半年，合浦一中学生庞自（庞文隽）在新安村何国达家，和吴世光、王廷钦、林施均（林树棠）、刘登（刘雨帆）、何醒予等组织成立“静励斋”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谈论国事，出版《群光》和《大风》（诗刊）两个油印刊物，以后到那里去的人不断增加。该会只有何家作为地点，没有固定成员，愿意来的人就可以读书参加讨论，来去自由，但影响相当大。

第三节 廉州中学的“艺宫”与“神灯”

合浦的廉州中学（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也有一批进步学生，出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对民族危机的忧愤，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不满，积极追求革命真理，阅读进步

书刊，传播革命思想。

当时伍瑞锴任廉中校长，他思想开明，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学生探讨学问，研究问题，开展争论，在他的启导下，很多学生读左翼文学作家的作品和新的社会科学书籍。

廉中学生中较早趋向进步的是高中班的张进煊、杜渐蓬、陈业昌等人。1932年秋，何承蔚（谈星）、李英敏（何世权）等考上高中班，何承蔚的二哥曾参加北伐军，受共产党人影响，思想进步，带回一批革命书刊藏在家中，让何承蔚阅读。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林超真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马列主义书籍。何承蔚认真读了这些书，有了革命的思想，能写很好的论文，具有雄辩的口才。李英敏最初是热衷于文艺，善于写小说诗歌，后来在何承蔚的影响下，也积极学习新的社会科学，树立革命观念。他们这个班趋向进步的人较多。

1933年秋，辛莽（吴裕春）、李廉东（李辛农）等考上高一，读进步书刊的人更多。在杜渐蓬的倡议下，以何承蔚那一班的进步学生为主，成立一个以研究文学为主的团体，取名“艺宫学术研究会”，成员有杜渐蓬、何承蔚、李英敏、罗文洪（周崇和）、辛莽、李廉东、谢潼关（谢有干）、韩师琪、钟顺资、王固远；女生有曾德才、黄秀英、王菊娟等，开始时只有二三十人，后来逐步扩大，最盛时达到100多人。

“艺宫”做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学习的书籍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邹韬奋、闻一多等人的文学作品；艾思奇、邓初民、李达、杨剑秀等人写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起初读的是何承蔚等人家中的藏书，后来人多了，书刊不够供应，便通过去广州读书的杜渐蓬等人设法购买，还和北海的“未名社”联系取得读物。在“艺宫”的组织带动下，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新的思潮，成为廉中学生思想的主流。

“艺宫”做的第二件事，是出板报，写诗文，反映学习情况，讨论学习中的问题，谈论时事、社会问题，以诗文讽刺专制反动统治，如杜渐蓬出了一本手抄的诗集《暴君的末日》，李英敏和李屏周（老师）合作出了一个诗刊，李英敏写了《霸王别姬》的长诗，辛莽画了讽刺画，还通过学生会举行时事测验和多次论文比赛。

“艺宫”做的第三件事，是大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宣传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投降政策，发动同学和到廉州街上动员群众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声援北海“九三”抗日事件。

廉中的教务主任张之迈教逻辑学，在课堂上宣扬形式逻辑，说他讲的逻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何承蔚立即驳斥，说张讲的逻辑学是老掉牙的老古董，辩证法才是最新的革命学说。张之迈要和何进行公开大辩论，何勇敢接受，打击了守旧的老学究的气焰（后因校长伍瑞锴劝说，公开辩论没有开成）。

“艺宫学术研究会”是公开的、群众性的。杜渐蓬毕业到广州升学后，何承蔚和李英

敏商议决定，在“艺宫”的成员中，挑选一些对马列主义感兴趣，决心投身革命的人，成立一个专门研究革命理论的秘密读书会，阅读密藏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党的秘密刊物，一个星期讨论一次，先由学有所成的人拟订学习提纲和讨论问题，分成几个小组学习和讨论。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教程》《社会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北海“未明社”从上海得来的党内刊物如《红旗》《斗争》《中华苏维埃成立宣言》《八一宣言》《红军捷报》等也秘密送给这个小组阅读。这个读书会“艺宫”的核心。

其后不久，廉中的进步教师庞乘风也找学生朱兰清等组织另一个学术团体，名为“神灯”，也推动同学学习进步书刊，讨论时事问题，宣传抗日救国；也出板报，写文章。当时廉中教务处前面的布告板，分成两列，“艺宫”和“神灯”各占一块，互相竞赛，有时也展开争论，十分活跃热烈。

“艺宫”和“神灯”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对进步书刊的学习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培养了一批进步分子，为党的发展造就后备队伍。其后，邹瑜（邹优瑜）、辛莽、李廉东、谢潼关等奔赴延安，在党的教育领导下，锻炼成栋梁之材。张进煊、杜渐蓬、何承蔚到广州读书，找到了党，加入党组织，成为领导干部。李英敏、朱兰清、罗文洪、曾德才、韩师琪等都入了党，参加革命。他们教育影响了一大批同学，为后来廉中和廉州党组织的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和人员。

中共中央领导对合浦地区的读书会活动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至1939年，在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曾两次表扬合浦党的工作，他赞扬合浦党的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较成熟的组织。

第五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调集大量兵力，疯狂“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之时，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制造事端，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反动方针，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中国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在短短的四个多月内，便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军进而逐步向华北入侵。

东北三省的沦陷，华北的危机，引起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爱国力量，纷纷强烈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于是，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城乡兴起。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起抗日示威运动，全国立即响应，其时，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和作出决议，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中共两广省委也相继发出通告、宣言等，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屠杀无辜群众，号召各地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建立群众的反帝大同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下，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两广军阀，于1936年6月1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两广事变虽然实质上是国民党新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客观上却顺应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因此，两广事变得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合浦，工农兵学商各界积极响应，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发表宣言、通电，呼吁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及各学校的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在这次抗日救亡运动中更是起到先锋作用。廉州中学（广东省立廉州中学）、合浦一中的师生同仇敌忾，或出墙报、编刊物，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抨击蒋介石集团屈辱退让、“剿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或走出校门，上街演说、演剧，唤起民众抗日救亡。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合浦不少青年学生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多次走出校门，到社会上清查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和宣传演讲活动，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还开展对训导主任马斋心和校长范公镇的斗争。马斋心咒骂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压制学生活动。范公镇不但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学生实施暴力阻挠，还准备开除这些青年学生。马、范的行为激起了合浦、北海青年学生的公愤，爆发了“驱马”“倒范”运动。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的学生先后罢课，向社会发出“告父老书”，揭露学校当局实行奴化教育，打骂和控制学生思想的劣迹。合浦青年学生的行动，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终于迫使马斋心向学生们认了错，范公镇下了台，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的青

年学生取得胜利。“驱马”“倒范”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次实践，它的胜利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的兴起。

第二节 建立“北海青年抗日同盟”

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以后，逐步向华北推进，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反共。1935年，日军已进到北平附近，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当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织下，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12月16日，广州学生联合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消息传到廉州、北海，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为进步分子掌握的学生自治会，即到各班去传播消息，决定联合各小学师生和工人、市民，举行抗日示威，响应“一二·九”运动。经过深入的组织发动，12月下旬，廉北两地都举行了2000人左右的抗日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保卫华北”等口号，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推动建立全县学生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推动合浦、北海的抗日救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以后，为了广泛地团结和发动青年抗日，扩大统一战线组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仍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成为青年组织的核心团体，开展青年工作。

1935年秋，黄铸夫为了寻找党组织，决定再去广州。临行前，赵世尧告诉他去找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杜渐蓬（曾在合浦一中读书，高黄铸夫一两届），说杜可能已和党取得联系，找到他就可以解决组织问题。黄铸夫到广州，通过合浦同乡的介绍，进入国民党政府广东省民政厅厅长林翼中（合浦人）办的广东省地方自治训练所学习，求得个立足的地方，他到中山大学找到杜渐蓬，说明意图和北海青年运动情况。杜渐蓬了解黄铸夫，坦白地对他说自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把一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交给他看，说明当前抗日的新形势和任务，以后会经常和他接头，给他布置工作，让他和北海的赵世尧保持联系。黄铸夫要求尽快解决组织问题，杜渐蓬说：“组织问题不是我们想解决就能马上解决的。要健全广东省组织，安排好各地发展党的工作；对每个要求入党的人要做严格的审查了解，保证政治上可靠；还要有一个教育提高，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过程。现在，先安排布置进行工作，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条件成熟了，组织就会找你。”杜渐蓬有时约黄铸夫到中山大学接头，对他进行党的教育，谈一些党的知识和做党员的条件、秘密工作的组织形式、活动方法、秘密工作纪律等。那时，曾在合浦一中读书的符荣业（化名符协）也在广州，跟黄铸夫联系，私下也向黄铸夫表示他已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杜渐蓬告诉黄铸夫，“一二·九”运动后，中共中央已决定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仍是党教育组织青年的外围组织。抗日青年可先加入“中国青年

抗日同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考验后再吸收入党，当时正在各地普遍建立“中国青年抗日同盟”。1936年春，黄铸夫在地方自治训练班毕业，杜渐蓬动员他回合浦工作，建立靠近党的青年组织，为建党组织准备条件。杜渐蓬提出，可把“未名社”的成员，按觉悟和可靠程度，分成核心骨干和一般成员，有层次地建立青年组织，按秘密活动的方式，分别实行单线领导，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不发生横的关系，同时，扩大外围组织，吸收更多的成员，至于这个组织是否就叫“中国青年抗日同盟”，杜渐蓬没有明确肯定。杜同时提议办一间销售进步书刊的书店，定名为“现实书店”。黄铸夫说，他这次到广州的目的，是寻找党的组织，要解决入党和在北海重建党组织的问题，希望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回去。杜渐蓬说建立党组织，条件尚未成熟，不是我们一下能解决的，建党问题，要放在下一步，目前先建立革命青年组织。黄铸夫接受安排，在1936年春回到北海。

黄铸夫回北海见到赵世尧，详细汇报了和杜渐蓬接触的经过、谈话的基本内容、共青团改为“中青”和杜要求在合浦先建立革命青年组织等问题，赵世尧同意杜的意见。随后，黄铸夫即回西场工作。

1936年4月，赵世尧按照杜渐蓬的意见，在“未名社”的基础上，建立革命青年组织。“未名社”读书会原来就有内、中、外三层，内层为骨干分子，政治可靠，觉悟较高，可以阅读上海寄来的党内书刊和传单；外层人员为一般进步分子，只供应和介绍公开、半公的书刊，讨论时事及一般的学术问题；中层介于内外两层之间。各层人员的思想比较复杂。有的人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计较个人利益，希望入党；有的人只为抗日或民主革命出力，不想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的人只为个人利益，怕苦、怕死，受不了纪律约束。赵世尧经过审慎考虑，挑选内层中政治坚强、觉悟较高、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希望入党的王文崑、庞国泰、周志刚（周小庭）、黄人善等18人，组成秘密的革命组织，取名为“北海青年抗日同盟”，学习党的文件，了解党的政策，按党的指示进行工作。至于为什么定这个名称，赵世尧认为，名称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团体的实质内容，北海青年就是中国青年，在北海用“中国青年”太广泛，用“北海青年”比较实在。

黄铸夫回到西场，按照杜渐蓬的意见，通知读书会的罗刚、朱明、黄模等几个骨干分子开会，传达杜渐蓬和赵世尧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建立靠近党的革命青年组织，吸收林国奋、裴凤芝、石起、包恭等人参加。黄铸夫提议取名为“中青读书会”，之所以用这个名字，黄铸夫认为：①这里有“中青”之名；②抗日包括不了我们的宗旨，我们还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③“同盟”一词有混同于古代的“结盟”的封建残余气味，词意不好。成立后，内部多次讨论有关党及抗日的问题，积极阅读马列主义书刊。

“北海青年抗日同盟”和“中青读书会”，都是按杜渐蓬的意见组织的，直接和他联系。但是，没有向广东省“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组织正式报告登记备案，也没有取得垂直的组织关系。因此，在广东省“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的档案中，没有它们的材料。但是，

它们实质上是当时党的外围组织，为北海和西场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

第三节 北海“九三”事件

两广事变后，1936年7月，蒋介石调动40万军队从粤、湘、黔三面围攻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紧急扩军备战，要同蒋介石战斗到底，得到了全国爱国人士的同情。中共党员宣侠父利用担任广西绥靖署上校咨议之便，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地做被贬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蔡廷锴的统战工作，推动他们抗日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增强反蒋力量，决定重建以抗日将领蔡廷锴为首的新第十九路军，发出通告号召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到南宁报到，并将到南宁的第十九路军旧部编为一个师，番号为六十师，师长由原第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担任。8月，为了反击蒋介石对广西的包围，抢占出海口，李宗仁、白崇禧命令第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翁照垣部迅速进驻合浦。

六十师到达合浦前，先派团长钟俊生到北海与赵世尧、冯德联系，召集合浦一中进步学生，共商配合六十师到合浦的抗日救亡事宜，并发动民众热烈欢迎进驻部队。接着，六十师政治部主任张梅生及政工人员曾眉（共产党员）、翁肇志也到北海，向赵世尧等讲明六十师是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部队，政治部内有进步人士领导。并筹备成立新的北海市政府，拟委任钟俊生为市长，赵世尧在市政府教育科工作，负责宣传、组织发动群众。赵世尧通知在西场组织读书会工作的黄铸夫以及罗刚、朱明到北海协助他工作。六十师的先头部队及政工队初到北海时，在街头刷写“打倒日本”“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标语，市民争先恐后围观，奔走相告，对这支爱国军队刮目相看。以赵世尧、冯德为首的爱国青年走上街头，燃放鞭炮，热烈欢迎六十师的到来。8月底，翁照垣率六十师正式开到合浦进驻北海，北海各界民众数千人会集于中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民众欢迎抗日英雄翁照垣暨抗日救国誓师大会”。会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欢迎抗日英雄第十九路军”等口号响彻上空，此起彼伏，给翁照垣以极大的鼓舞。翁照垣和赵世尧分别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北海各界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坚决抗日。会后，还举行声势浩大的军民示威游行。

东北三省的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无能屈辱退让，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华北、西南相继发生了汉奸、日侨和日军被杀或被扣事件，造成了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被动。翁照垣部也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扩大影响，逼蒋介石抗日。因此，翁照垣部进驻北海后，便对外籍侨民和嫌疑分子进行排查，以消除不利于抗日的人和事。在排查时，对英、法、德等国人员嫌疑逐一排除，北海有个名叫中野顺三的日侨引起翁照垣的注意。此人早年侨居北海，娶廉州女子为妻，在北海开有一小药房，名为“丸一药房”，是香港日本丸一药

行的支店，主要经营日本制的成药，还兼营玩具和其他外国产品。据北海市民反映，这个日本人有间谍嫌疑，他常以打鸟钓鱼为名，走遍合浦、北海、钦州及沿海一带，秘密绘制地图和测量港口航道水深及记录潮汐等情况。又据北海海关职员反映，中野顺三一切听命于日本政府，每年都得到日本政府津贴，每星期向日本政府作一两次报告。于是，翁照垣对中野顺三进行周密的调查。调查结果符合市民的反映，翁照垣与张梅生等认定中野顺三就是日本间谍，决定采取刺杀中野顺三的行动，再掀起反日浪潮，进一步逼蒋介石抗日。正在这时，第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到合浦召开军事会议，翁照垣将张梅生收集的有关中野顺三的情报向蔡廷锴汇报，并提出刺杀中野顺三的计划，得到总司令的默许，翁照垣就安排张梅生负责完成刺杀中野顺三这一计划。张梅生从北海驻军中挑选5人，从合浦师部挑选2人，组成便衣行动小组。刺杀中野顺三前一星期，翁照垣召见了北海商会会长，以军事对峙时期，地方情况混乱，为免保护不周发生意外为由，要求商会会长劝中野顺三限期离境。中野顺三也觉得事情不妙，赶紧停业，不敢出动，想逃之夭夭。便衣小组早已摸清中野顺三的相貌特征和他的家居情况，推测他准备逃离北海，就准备刺杀他。9月3日傍晚，刺杀行动小组7人来到中野顺三药店，除留2人把守门外，其余5人进入药店，谎称要买药，然后冲入内室，刺杀了中野顺三。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北海“九三”事件。

“九三”事件发生后，翁照垣马上授意六十师政训处处长陈汉流写一篇关于刺杀日本间谍中野顺三的消息，于第二天送到《合浦半周刊》，消息当天发表，简单地报道了日本间谍中野顺三被刺杀的消息。消息传开后，合浦、北海市民议论纷纷，都拍手称快。李宗仁得知消息，也发电报来询问此事之真相。陈汉流按照翁照垣事先统一的口径，按照《合浦半周刊》登载的稿件重抄一遍外，还加上说明：为了中野顺三的安全，曾劝其离开北海，以避群众怒锋，但中野顺三不从，卒为群众所杀，云云。李宗仁也照此电告了广东当局。

同时，张梅生到合浦一中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当前局势和布置组织北海抗日救国事宜，决定成立北海学生抗日救国会，推选赵世尧、吴世光、庞国泰等负责。并派人到码头工会、驳艇工会等处联系，推动全市性的抗日救国组织，确定以“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名进行活动。

“九三”事件几天后，中野顺三被刺杀的消息在粤、港等地传开，引起海内外轰动，日本政府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9月8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召见国民党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查询北海“九三”事件的情况，并嘱必要时派人去调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中村也到外交部特派员公署求见刁作谦，表示日本要派飞机前往北海，调查“九三”事件。刁作谦畏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敢贸然答应，婉言拒绝。中村又在刁作谦的秘书凌士芬陪同下，会见了广东省主席黄慕松，再次表示日本要派军舰到北海去调查“九三”事件的强硬态度，黄慕松依然不作正面回答。日本当局对中国方面的表态不满，横蛮地要单方面于9月9日派遣“嵯峨”号军舰前往北海。刁作谦闻讯后觉得形势紧迫，也急

令凌士芬赶到北海调查。当天下午5时，凌士芬带着随员在黄埔港登上粤海军“福安”号军舰，绕道兼程前进，于9月12日上午9时，先日舰之前抵达北海港，并乘海关的小艇欲登陆，但遭到北海驻军的拦阻，迫使凌士芬返回军舰。同时，赵世尧等在张梅生的指导下，以“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中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民众反对蒋介石政府卖国外交政策大会，发动全市学生、工人、市民数千人到海关码头抗议凌士芬到北海调查。后来，翁照垣派陈汉流、张梅生与凌士芬交涉，允许凌士芬等5人登陆。凌士芬一行在陈汉流、张梅生的陪同下，走出海关码头。这时，沿中山路一带的街道挤满了示威群众，人人手里拿着写有抗日反蒋标语的各种绿红三角小旗，不断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屈辱外交”“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口号。凌士芬一行在群众的一片抗议声中同北海军政方面的代表（六十师参谋长丘国珍和合浦县代理县长林宗汉）举行了谈判。当凌士芬提到日本军舰将至，日方代表要上岸调查时，丘国珍表示强烈反对，声称绝不容许日方登陆调查，如果日本军舰强行登陆，一定给予炮击。在谈判过程中，示威群众将市政局团团围住，强烈要求凌士芬出来回答问题，当凌士芬出来回答问题时，示威群众便向凌士芬递交请愿书、抗议书，并欲冲入谈判厅示威。后经丘国珍调解，群众选出赵世尧等7名代表进入谈判厅与凌士芬交涉。群众代表在凌士芬面前慷慨陈词，控诉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杀害我国同胞的罪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凌士芬一行参加北海群众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但遭到凌士芬的拒绝，因此，谈判不欢而散。凌士芬无法得到调查结果，再不敢谈判，匆匆离开谈判厅，示威群众高呼口号，一路尾追，凌士芬一行狼狈不堪地逃回军舰。国民党“福安”号军舰返航时与日本“嵯峨”号军舰相遇，凌士芬告知北海军民实情，劝阻“嵯峨”号驶往北海。日本人知情后，深知也会调查无果，于是国民党和日本人想来北海调查的两艘军舰无功而退，仓皇逃离北部湾海面。

在日本，日本人认为北海“九三”事件事态严重，国内也掀起了轩然大波。9月10日，东京各报都刊登北海“九三”事件的消息，极尽煽动之能事。日本右翼组织的强硬派代表便晋謁了日本首相广田等，并质问：“何不占领海南岛，以保障该处日侨之安全？”公然发出战争叫嚣。日本海军中央部接到日舰“嵯峨”号发回的第十九路军拒绝日舰人员登岸调查的电报后，于9月14日举行海军首脑会议，决定采取向中国方面施压的强硬态度。于是，日本海军派出“球摩”号巡洋舰、“大刀风”号一等驱逐舰、“基竹”号二等驱逐舰、“刈萱”号、“朝歌”号、“芙蓉”号等6艘军舰驶向北海。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加大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施压。

9月中旬，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下台，委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采取军事压力和利诱收买手段，谋求两广事件和平解决。李宗仁、白崇禧也被蒋介石的软硬兼施所震慑，发出和平通电，与蒋介石妥协。9月15日，李宗仁电令第十九路军六十师撤出合浦。蒋介石指令粤军余汉谋部谭邃、巫剑雄一

五九师赶往合浦。9月21日，一五九师进驻合浦，六十师撤出合浦，双方举行了交接仪式。

在六十师撤出合浦之前，张梅生到合浦一中召集赵世尧等学生骨干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张梅生指出：①蒋介石利用广东军打第十九路军，六十师如不撤出合浦，双方火拼，对抗日反蒋不利。②六十师计划撤往十万大山，开辟武装抗日根据地。③要求动员一批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参军，充实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力量。④要求留在北海的青年学生多做群众工作，深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以备第十九路军回师反击之需。会后，合浦、北海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响应，踊跃参军，成立一个30多人的随军学生队，与香港进步青年曾眉、张凤楼等一起在六十师师部政工队工作。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刁作谦的秘书凌士芬在北海遭遇到难堪之后于9月15日返回到广州，正拟向蒋介石汇报调查情况，便接到广州当局通报，说一五九师正向合浦推进，第十九路军准备撤出合浦。日本方面也接到了六十师准备撤出合浦的消息。国民党当局又再次委派凌士芬前往北海，日本方面又再次派军舰去北海。于是，9月17日，凌士芬乘坐粤海军军舰“福安”号、“通济”号和日本调查员乘坐的“嵯峨”号军舰一起赴北海进行调查。9月19日早晨抵达北海，停泊在冠头岭海面外，等待六十师撤离合浦。

先期到达北海的日本海军六艘军舰在北海海面游弋，耀武扬威，不停地进行武力威胁。9月21日，日本驻南京的武官电告日本调查员，翁照垣的六十师已撤出合浦，粤军一五九师已接防。次日，一五九师参谋长许让玄和北海绅士刘瑞图乘坐海关小艇到“福安”号军舰会见凌士芬，告知凌士芬六十师已撤出合浦和北海，一五九师已接防进驻合浦。随着又到日本军舰“嵯峨”号会见日本调查员，告知日方有条件地允许上岸调查，规定：①只许“嵯峨”号人员登岸，且必须开列登岸人员名单，待中方通知后才允许登岸调查；②日方登岸人员不许配备武装及携带照相机；③调查时必须按照中方限定线路进行。日方无奈，勉强同意。9月23日，日本调查人员与凌士芬一行在许让玄和刘瑞图的陪同下登岸上北海，开展对北海“九三”事件的调查。

日方人员上岸调查时，北海驻军沿路警戒，戒备森严。日方人员乘坐的汽车也用木板将窗户盖住，不让日方人员窥视沿途情况。在调查时，日方人员除询问北海警察局及有关人员外，还询问了中野顺三的妻女和外籍人士，最后开棺验尸，并带走了中野顺三的3本日记及7封书信。9月24日傍晚，日方人员携带中野顺三的骨灰及其遗属返回日本军舰“嵯峨”号，与其他6艘日本海军军舰相继离开北海。

随后，日本方面就北海“九三”事件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广东余汉谋当局进行了频繁的外交磋商。9月28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谈话，称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反日事件，“其中数件事为共产党图谋离间中日关系……现即应采取断然步骤，除其根患……”并提出“中日合作制止共产党活动实属必要”。这是日本以“共同反共”为幌子，企图拉拢蒋介石，因而对北海“九三”事件就不太苛求了。鉴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一边安抚日本人，

叫他们不要急躁行事以免被共产党从中利用；一边抓紧解决广西问题，对李宗仁、白崇禧软硬兼施，又拉又压，逼令他们调走六十师，又解散十九路军。北海“九三”事件经过反复多次交涉，于12月31日中日双方才正式了结，国民党政府除向日方“深表歉意”外，还给予中野顺三遗属3万银圆抚恤费，轰动一时的北海“九三”事件遂告结束。

北海“九三”事件是继北平“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一连串反日事件中的一环，它是北海军民实行的一次抗日救亡行动，与全国的抗日救亡形势紧密相连。这次事件轰动全国，中日两国为此事件外交活动频繁，国内外主要报刊连续报道，毛泽东曾将其与成都事件一起提及，称为新的抗日浪潮。北海“九三”事件产生的原因及其背景虽然复杂，但它顺应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潮流，使全国特别是合浦又掀起一个抗日的高潮。

北海“九三”事件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北海“九三”事件的发生，造成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困境，极大地促进了合浦人民的觉醒，振奋了合浦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增强了合浦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此事件发生后，合浦人民又掀起抗日反蒋、逼蒋抗日的热潮，迎接合浦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合浦的先进知识青年在“九三”事件中经受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坚定地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合浦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北海“九三”事件对合浦地区民众觉醒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动员合浦以及钦廉四属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

第四节 抗击国民党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

北海“九三”事件触动了国民党的神经，事件结束后，国民党当局拼命加紧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以维持其在钦廉四属的统治。实行镇压的第一步就是向第十九路军开刀，在蒋介石和李宗仁施加的压力下，第十九路军被改编，抗日将领李济深、蔡廷锴等被迫寓居香港。接着就是将六十师中的翁照垣、丘兆琛、丘国珍等将领解职，以此手段来削弱抗日救亡力量。在第十九路军六十师撤离合浦时，杜渐蓬（中共党员）专程从广州返回合浦，向赵世尧了解北海“九三”事件全过程。弄清事实真相后，杜渐蓬与赵世尧、翁绍志（六十师留下的善后人员）、韩师琪等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北海“九三”事件后的形势，会议决定派赵世尧去广州，黄铸夫回西场，大家保持通信联络。原来参加第十九路军政工队的一批合浦进步青年学生随军西撤，伺机留驻十万大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王文崑等30多名合浦进步青年学生在张梅生率领下撤到钦州，由宣侠父对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第十九路军被迫改编后，这批合浦进步青年学生除符荣业、庞国泰随军去广西外，其他的都回到家乡。

一五九师进驻合浦后，立即对北海“九三”事件的积极分子及随第十九路军西撤的进步青年进行调查，想以此追查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组织，遏制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北平

“一二·九”运动之后，合浦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既多样又活跃，他们大搞示威游行、大唱抗日革命歌曲、大张旗鼓地贴标语、出版刊物和墙报、大办读书会引导人们阅读进步书报，关心时事政治。在两广事变后和西安事变中，合浦青年学生积极拥护共产党和张学良将军的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拥护抗日反蒋的第十九路军进驻合浦并与其积极配合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一五九师进驻合浦后，合浦人民群众不因六十师撤离而影响抗日救亡活动，而是继续进行下去。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各级各班所组织的读书会仍然继续活动。时任合浦一中训育主任的马斋心思想较为反动，他很不满意进步青年学生的各种各样的进步活动，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把发现有人利用传达室接收上海发行机关寄来的刊物和传单的情况报告一五九师，说发现学校里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虽然表示接受停止反共内战，团结抗日，但国民党仍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一五九师接到马斋心的密告后，于1937年1月7日上午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合浦一中，对学生采取逮捕行动。当天从学校各班级分别把陈广才、岑嘉毅、吴世光、张家保、利培源、伍朝汉、庞自（庞文隽）等10多名进步学生押出学校，第二天，廉州的张文纲、常乐的李士环、北海三小的青年教师冯德相继被捕，其中有的是随六十师西撤刚返回合浦，这些被捕的学生都是学生会的成员。在被捕的学生中没有发现赵世尧和黄铸夫，一五九师便发出通缉令，缉捕赵世尧和黄铸夫等学生骨干，赵世尧和黄铸夫等被迫转移到广州、香港，合浦的读书会活动进入低潮。

反动武装把被捕的学生关押后，即对学生进行训话和分别审问，在训话中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反动分子的审讯和训话没有吓倒学生，他们与反动分子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由于军方没有抓到任何共产党的证据（那时合浦北海还没有重建共产党组织），社会舆论倾向进步学生，抗日救亡是爱国主义大趋势，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分子把这批学生关押10多天后只好释放，冯德被关押3个多月。

国民党镇压合浦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因遭到被捕学生更顽强的抗击和社会人士的反对而失败。这件事使学生们受到一次现实教育，从而更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提高了革命思想觉悟，很多人在中共合浦地方组织重建后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大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